

全面深化改革与公平公正精神

——基于和平学视角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解读

陈明胜^a, 孙宏斌^b

(南京审计学院 a. 马克思主义学院; b. 党委宣传部,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 国际国内形势日新月异, 和平学理论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公平公正的精神贯穿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这一点与和平学的理论高度契合, 是中共中央执政理念合规律性的重要表现。从中国的现实出发, 改革、发展、稳定仍然是当前社会的主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这一主题的深化, 表达了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和平崛起、和谐发展的愿景。

[关键词] 公平公正; 和平学理论; 执政理念; 结构暴力; 全面深化改革; 发展; 稳定; 十八届三中全会; 公平与效率关系

[中图分类号] D08; D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750(2014)03-0017-07

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共中央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大会, 此次全会针对未来中国发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召。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该《决定》特色之一就是贯穿了公平公正的精神, 契合了现代和平学的理论, 显示出中共中央执政理念的合规律性。

一、公平公正: 现代和平学理论的核心要素

现代和平学创始人约翰·加尔通把和平类型分为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两种, 两者分别对应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直接暴力包括战争、冲突或语言侮辱等对人的身体、精神及给社会带来的伤害、痛苦和破坏; 结构暴力则包括贫穷、疾病、压制性体制、不平等、社会歧视等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和灾难^[1]。可以说, 积极和平与结构暴力等理论的提出, 大大拓展了和平学的理论空间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促使人们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隐性暴力进行更加深刻的反思, 以寻找到导致暴力产生的根源, 并通过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后来, 加尔通又提出“文化暴力”的概念, 并指出“文化暴力被认为是其他暴力形式的源泉, 它肯定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的合理性。文化暴力存在于宗教、法律、意识形态、语言、艺术、经验科学、宇宙论中, 并通过学校和媒体进行传送, 产生了社会中的憎恨、恐惧和猜疑。有些结构暴力就是建立在性别和种族的文化标准上的, 由于阶级或职业不同, 人也被划分为更有价值或不重要”^{[2]112}。这样, 和平学又增加了新的因素, 和平公式也就变成了: 和平 = 直接和平 + 结构和平 + 文化和平。也就是说, 只有消除直接暴力、结构暴力、文化暴力, 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真正和谐。

我们用和平学的理论来审视人类历史可以发现, 直接暴力、结构暴力、文化暴力都是经济社会发

[收稿日期] 2014-01-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108)

[作者简介] 陈明胜(1978—), 男, 山东聊城人, 南京审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 孙宏斌(1971—), 男, 江苏高邮人, 南京审计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

展的产物。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祖先古猿作为万物生灵中的一种,完全遵循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过着平等的生活。在部落社会,自由平等因战争与冲突而遭遇挑战,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划分导致奴役与被奴役关系的产生,这一状态在阶级社会成为常态,战争在更大范围内爆发,甚至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在直接暴力发展的同时,结构暴力也在潜滋暗长,随着劳动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提高,劳动产品出现了剩余,产品的分配由勤劳、勇敢与否等自然因素逐渐让位于实力对比、集团划分等人为因素,在此经济基础之上,一部分人上升为统治阶级,另一部分人下降为被统治阶级。在此之后,基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继承制度,虽有意识形态的保驾护航,但结构暴力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其根源则是由于阶级不平等而造成的对公平公正的损害。随着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世界历史进入近代,自由、平等、人权、公平、公正等词汇成为时代的热词,资本主义虽然仍未在阶级平等方面实现质的突破,但却使人们的认知水平大大提高,使人们更加重视自身权利的实现,人生而自由平等的信条深入人心。人们对各种形式专制的挑战,使结构暴力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露了阶级社会的本质,并给人类社会设计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理想,但其实现仍然任重道远^①。至于文化暴力,史实证明,它是直接暴力与结构暴力的根源,在战争频仍的年代,文化的暴力色彩比较浓郁;随着战争的结束,文化的和平色彩就会彰显。就目前来看,文化暴力更加值得重视,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暴力文化通过互联网可以达到迅速传播的目的,其必然会对直接和平、结构和平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因为核威慑、多极格局以及人们对和平的珍视等诸多因素,和平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直接暴力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结构暴力,根据结构暴力的概念,其根源主要是由压制性体制、不平等、社会歧视等因素而导致的不公平和不公正问题,这些因素构成了通向积极和平的最主要的障碍。加尔通强调,只有消除了社会的各种不平等关系,才能消除结构暴力,最终实现积极和平^[3],因此,公平公正成为积极和平的核心组成要素。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我们要消除结构暴力,其根本途径则是重新审视和调整社会结构,实现公平公正。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因为贯穿了公平公正的精神,也就成为新时期指导中国和谐发展、和平崛起的纲领性文件。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蕴含的公平公正精神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改革的总目标,特别是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方面作出的重要决定,显示出中共中央对社会公平公正和人民福祉的重视,实际上为各种结构暴力的消除提供了政策性依据。

从改革的总目标来看,《决定》确定了未来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除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外,还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4],表明中共中央对当前我国社会公平正义遭遇危机的重视以及促进公平公正的决心。根据《决定》,今后改革将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防止“攻其一点,不顾其余”;其目标则是“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4]。根据西方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它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整体是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的,任何部分的变化都有可能引起其他部分的变化,然后趋于新的平衡。所以,未来的改革必然是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应该避免以新的不平衡代替旧的不平衡。就个人而言,只有拥有了公平竞争的机遇和机会,人的各种潜力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才可以防止出现由不平等、社会歧视等因素而导致的结构

^①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愿望,但在“和平长入”无望的情况下,阶级斗争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暴力。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中国梦时这样强调,中国人民应该“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5]。而享有机会的前提就是公平公正。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提出“人能尽其才、物能尽其用、地能尽其利、货能畅其流”的口号,此次改革目标的确立无疑是对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强国富民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 经济上的平等是公平公正的前提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决定》进一步提升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提出“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口号。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公平公正的平台,也就为非公有制经济经营主体提供了均等的机会。《决定》特别强调“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4]8}。这种对产权的保护与重视,其最终指向就是为更多人提供平等的机会,防止那些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不但有利于国有企业“适应市场化、国家化新形势”,推动其“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4]10},而且可以为化解因利益固化、垄断、贫富两极分化而激化的矛盾提供政策性支持。而关于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规定则进一步回应了人们对机会均等的诉求,机会均等则为人们施展才能提供了舞台。同样,在完善现代市场体系部分,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决策都体现了公平公正的精神:只有公平开放透明,所有市场主体才能展开平等竞争;只有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才能实现价格制定的平等;只有建立城乡统一用地市场,才能缩小城乡差距,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即如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也将为人们提供更多公平竞争的机会,避免因体制原因而导致能进不能出、尸位素餐的现象。其他诸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等,亦贯穿着公平公正的精神。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决定》提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4]16}。近年来,因为执政理念老化而造成的粗暴执政情况时有发生,导致不少恶性事件出现,进而使政府公信力不同程度受损,因此,只有不断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在执政的过程中体现人文主义的精神,按规律办事,才能挽回政府的公信力,进而提高执行力。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决定》提出“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的管理。对于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来讲,税制不同就是实质上的不平等,其最终导致公平竞争丧失基本的意义,所以,统一税制极为必要。在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方面,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4]22}。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改变新中国成立以来牺牲农村发展城市、剥夺农业发展工业的格局,农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总之,以上提法表达了我国经济结构要进一步趋于合理化的要求。

(二) 政治上的平等是公平公正的关键

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看,《决定》提出“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总体要求。协商民主被提到更高的层次,从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到参政协商、社会协商,从专题协商、对口协商到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民主的过程就是协商的过程,在协商中各方意见得以充分发表,在相互妥协的情况下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这就是民主的最大化。总之,未来改革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同样,公平公正又是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能否公正司法与执法成为能否建成法治中国的关键。《决定》要求在执法的过程中,“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经费由财政保障制度,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4]33};在司法的过程中,既要确保司法机构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监察权,又要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

权司法保障制度。总的来说,公平正义成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出发点与归宿。就以往实际情况看,对公平公正产生威胁的根源是权力的滥用,“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为权力的约束机制出现问题,结果就是权力成为权力拥有者寻租的资本,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成为《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不但要求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还要求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其最终目的就是通过制度的建构打造一个坚固的“笼子”,使之成为保障人民权利、为民造福的利器,使权力为民所用。

(三) 社会中的平等是公平公正的基础

在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直面当前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希望通过推出公平公正的措施加以解决。比如,在教育方面,《决定》提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4]43}。这种对细节的规定,不但加强了政策的可行性,也表明这些问题确实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矛盾激化的焦点。在就业方面,《决定》提出“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4]44}。毫无疑问,身份、性别歧视是结构暴力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社会重大问题的同时,一定要避免因人为因素而导致的矛盾激化。对于失业的关注则更是《决定》的一大亮点:“增强失业保险制度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完善就业失业监测统计制度”,“创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畅通职工表达合理诉求渠道”^[4]。这些规定既是为了实现公平公正,也是为了有效化解劳资之间的矛盾。在收入分配方面,《决定》提出不但要确保初次分配的公平性,还要防止二次分配出现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可能性,即“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4]46}。在社会保障方面,《决定》则是要求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合理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4]47}。使改革的红利惠及每一个人,无疑是平等的重要体现。在医药卫生体制方面,《决定》提出“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加强区域公共卫生服务资源整合”,“鼓励社会办医”,“社会资金可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4]48}等,这些政策不但将促进医药卫生资源向全社会合理分布,而且有利于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促使一个生动活泼医药卫生市场的出现。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方面,《决定》则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总之,改革的最终目标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四) 文化上的平等是公平公正的动力

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决定》提出“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推动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理顺关系”^[4]。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来看,文化的活力源于实践、源于民间,《诗经》即有风雅颂之分,并逐渐形成此后中华文明雅俗共赏的成长路线。鉴于当前我国文化市场活力不足、缺乏创新的局面,只有推行宽松的文化体制,才能使更多的聪明才智充分释放出来,使中华文明绽放新的光彩。当然,放开文化并不是政府完全不管,而只是政府在文化体制中的角色发生质的转变——从文化的垄断者变成文化的管理者。同时,《决定》又提出了“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等规定^{[4]39-41}。毋庸置疑,政府的超然姿态,文化主体的平等参与,将更加有利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局面的出现。

必须说明的是,就《决定》内容来看,除了强调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外,其对文化和平还没有给

予充分的重视,这一点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因为文化和平是和平的源泉,它需要“以和平的合法性代替暴力的合法性。在宗教、法律、意识形态、语言、艺术、科学以及学校和媒体中,建立一种积极的和平文化,它意味着打开而不是抑制人类的不同倾向和才能”^{[2]112},即我们在保证文化主体公平公正参与的同时,还要注意文化内容的和平属性,只有和平文化的熏陶,才能培养热爱和平、珍视和平的现代公民,才能使文化成为推动全面和平实现的动力。

(五) 生态中的平等是公平公正的重要条件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同样体现了公平公正的精神。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古代中国就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但就当前实际情况看,部分企业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对废气废水的大肆排放已经严重危及人们的身心健康,如河北钢铁公司的大气污染、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水污染等都造成严重的后果,构成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动因。而各级政府部门的监管不力,则导致我国自然环境雪上加霜,挥之不去的雾霾、不断扩散的沙尘暴、日渐严重的资源滥用,使人们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了怀疑。为了共同的生存环境,《决定》提出不但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还要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等。为了避免走西方发达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企业单位就应该树立起良心的自觉,“不吃子孙饭,不发断子绝孙财”;各级政府部门就应该不断完善各种制度,实现用制度保护环境,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未来中国的深化改革是在公平公正基础之上的改革,中共中央对公平公正的关注,不但使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与和平学的理论高度契合,也进一步深化了改革、发展、稳定的时代主题。

三、公平公正是对改革、发展、稳定的深化

就中国实际国情来看,改革、发展、稳定仍然是当前社会的主题,这不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核心精神,而且与公平公正的实现密切相关。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核心内容是改革,改革的目的是求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而这一切的实现都是以稳定为前提的:就国际上来讲,就是要塑造更加友好和睦的外部环境;就国内来说,则是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这两个方面无疑又是和平学的应有之义。

首先,公平公正是改革的重要目标,改革是实现公平公正的基本手段。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动因是当前中国社会涌现出很多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性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领导干部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6]。毋庸置疑,这些因素不属于直接暴力的范畴,但所有的问题又都有可能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形成对持久和平的威胁,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深化改革,通过改革来消除不和谐的因素,推动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

其次,公平公正是发展的基本内涵,发展是实现公平公正的重要保障。发展主要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两个方面。发展是消除结构暴力和直接暴力的根本途径。陈晓律指出,寻求和平的愿望只有与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时,才更具有现实意义^[7],可谓一语中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还要落实到人的全面发展上来。约翰·加尔通认为:“暴力定义主要体现

在‘现实的’和‘潜在的’这两个单词上。暴力可以定义为‘潜在的’和‘现实的’之间差距的原因,即人们能够得到与实际得到之间差距的原因;暴力可以增加潜在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也可以阻止两者差距的减少。当人们食不果腹甚至因贫穷而死,当人们遭受能够预防疾病的痛苦,或被剥夺应有的教育、住房、工作的机会,暴力就发生了,虽然可能没有炸弹和枪炮的袭击。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关注于战争或武装冲突这样的直接暴力,却忽视了制度层面的结构暴力。结构暴力在平时可能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稳定状态,但一旦发生质变,就会引发冲突甚至战争。”^{[2]111}也就是说,在经济、科技不发达的年代,贫穷和疾病不一定导致结构暴力,因为在面对贫困、死亡时,大家都无能为力;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有能力消除贫穷和疾病却不能实现机会均等时,结构暴力就产生了。根据这一理论,要消除结构暴力,最根本的方式就是不断改革,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每一个人。同样,发展不但是实现国内积极和平的根本方式,也是中国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物质基础,毕竟,在当今世界,雄厚的经济实力仍然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

最后,公平公正是稳定的前提,稳定则是通向全面和平的必由之路。稳定包括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两个方面,不管哪一个方面出现问题,改革与发展都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通向和平的重要途径。但稳定还不等于和平,从形式上看,稳定是指国内外环境和谐,不存在战争与冲突的隐患;从内涵上讲,稳定是指直接暴动与战争的不在场。换句话说,稳定还停留在消极和平的层面,其离全面和平的实现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正如前文所言,全面和平包括直接和平、结构和平、文化和平三重含义,战争与冲突消失了,直接和平也就实现了;但就结构和平来看,只有系统全面的深化改革,消除不平等、不公正的根源,才能使社会结构更趋合理,才能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和平。

总之,改革、发展、稳定是邓小平执政时期就提出的时代主题,这一主题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等各项成就的取得都与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主题密不可分。今天,中共中央把公平公正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点,则既是对时代发展所带来社会问题的正视,也是对改革、发展、稳定这一主题的继承与发展。

四、结语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方面都做出了深化改革的决定,这五个方面又贯穿了公平公正这条红线,其中,经济上的平等是公平公正的前提,政治上的平等是公平公正的关键,社会中的平等是公平公正的基础,文化上的平等是公平公正的动力,生态中的平等是公平公正的重要条件,五位一体的改革图景因凸显公平公正的精神而显示出更加强烈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就公平公正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内在联系来看,公平公正无疑是对这一社会主题的深化,表达了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和平崛起、和谐发展的愿景。

需要指出的是,《决定》虽是未来中国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但它并不限于大而化之的宏观性指导,细致入微的规定增强了它的可执行性。譬如教育方面,教育部之前出台的“划片入学”政策,本来是为了遏制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现象,但却加速了“学区房”和“走后门”的畸形发展,使择校变成了家庭财产和社会资源的比拼,实际上造成新的不公平产生。为了实现教育的公平公正,各地方就应该严格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的难题等^{[4]43}。

进而论之,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但高度重视如何消除结构暴力的问题,还积极应对直接暴力可能发生的威胁。为了预防直接暴力,《决定》提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如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最终目标则是建立“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

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以捍卫国家的安全。再如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我国周边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而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国内各种不法势力的活动亦不容小觑。为了确保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健康发展,我们一方面主动伸出橄榄枝,表明中国和平崛起、和谐发展的愿景,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成立协调统一的国家安全领导机构,可以有效打击国内外反华势力和不法势力的颠覆活动。

对结构暴力和直接暴力根源的全面关注,使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与现代和平学的理论高度契合,因此,如何在未来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消除因贫穷、疾病、压制性体制、不平等、社会歧视等导致的结构暴力,如何预防战争与冲突的发生,也就成为中共中央面临的重要任务。决策与科学理论的一致性,说明中共中央在制定改革发展的规划时,更加注重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政策的合规律性,是考验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也是进一步发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 [1] Galtung J.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69, 6: 168 - 175.
- [2] 刘成. 和平研究引论[J]. 学海, 2010(3): 110 - 113.
- [3] 卢彦名, 熊莹. “人类历史上的对抗、冲突与化解”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J]. 国外社会科学, 2005(4): 77 - 80.
- [4]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5] 习近平. 再接再厉, 继续为实现中国梦奋斗[EB/OL]. [2013 - 03 - 17].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3-17/4650079.shtml>.
- [6]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7] 陈晓律. 从发展的角度理解和平学——兼评安德鲁·瑞格比的《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J]. 南京大学学报, 2005(2): 36 - 43.

[责任编辑: 黄 燕]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nd the Spirit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An Interpretation on the *Decision*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ace Studies

CHEN Mingsheng, SUN Hongbin

Abstract: Wi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s changing rapidly with each passing day, the theory of Peace Studies is being improved and developed. The spirit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runs through *The Decision on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which is not only in line with the theory of Peace Studies but also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regularity of the ruling no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Given the reality of China,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are still the main themes of Chinese society, the deepening of which by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reflects the aspiration of the new leader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mooth emergenc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Key Words: fairness and justice; the theory of peace studies; ruling notion; structural violence;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development; stability;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